

文化的觉醒与文学的选择

——论五四乡土小说与民间文化之关系

江卫社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觉醒与文学的选择 :论五四乡土小说与民间文化之关系
/江卫社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7.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17辑)

ISBN 978 - 7 - 80128 - 925 - 4

I. 文...

II. 江...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80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24716(发行部) 64963101(邮 购)

64924880(总编室) 64963107(编辑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 - 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25 印张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355.00 元(全 16 册) ISBN 978 - 7 - 80128 - 925 - 4/B · 138



内容摘要

本书论述了五四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化进行审美观照的缘起、方式、角度、内涵,及民间文化对五四乡土小说的艺术精神、情感特征、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影响。作者以为,五四社会政治思潮与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五四作家自觉的文化选择等共同促成了五四乡土小说从民间取材,并以“现代”的眼光对民间文化进行了形象展示、理性批判与合理吸纳。五四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化的文学观照,既有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批判锋芒,又有以废名、沈从文作品为代表的对民间文化风俗的美化、沉迷与眷恋(不排除两者有交叉的创作倾向)。两种创作倾向都表现出了作家力图从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叉叠合处找寻民族文化自新,与民族文学重造契机的可贵尝试。鲁迅乡土小说以其思想的深邃与格式的特别创立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他的小说成为五四以后小说创作的模仿对象;而废名、沈从文的民间文化梦却也因现代文明负面效应的凸显而越来越具有文化反思意味。五四乡土小说在学习西方的文学创作方法的同时,又从中国民间文化中汲取了自由抗争的精神内涵、真实自然的美学风格以及生动活泼的讽刺手法等。五四乡土小说还以其不同的地方文化蕴味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都为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提供了经典文本与理论资源。



文化的觉醒与文学的选择——论五四乡土小说与民间文化之关系

总之,文化的觉醒促成了文学的现代性选择,而文学的创新又体现并推动了文化的民族化、现代化、世界化发展。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ause , way , angle , meaning of reflecting folk culture made by May Fourth local stories , and the influence made by the folk culture on art spirit , characteristic of feelings , manifesting methods , etc. of May Fourth local stories. The author says , the trend of May Fourth political thought ,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May Fourth Literature Revolution and the wakened cultural choice of May Fourth writers , etc. cause May Fourth stories narrate folk people and its culture. These stories also reflect the folk culture visually , criticize it rationally and adopt it reasonably in light of point of view of modernity. The May Fourth local stories not only flash their critical cutting edge on folk culture represented by Lu Xun s local stories , but also have the feature of beautification , intoxication to folk custom and love to loc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Fei Ming and Shen Cong - wens local stories as well. Both put up the author s intention of rebuilding a nation s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n the common basis of modern and folk culture. Lu Xun s local stories established the good tradition of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by his stories deep idea and special format. So Lu Xun s local stories became the model of post - May Fourth writers. The folk culture dream of Fei Ming and

Shen Cong - wen has more and more cultural reflective meaning with the displaying of negative aspects of modern culture. While learning from the foreign literature ,the May Fourth local stories absorbed the liberal rebellious spirit , real and natural aesthetical style and vivid satirizing technique etc. from folk cul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The May Fourth local stories also exhibited their local colors based on various local cultures. All these supplied classical texts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 Literature of thirty and forty ages.

In a word ,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propelled the modernity choice of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novation also embodied and promot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nationalization ,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目 录

内容摘要.....	1
Abstract	1
绪 论.....	1
第一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间取向	
——论五四乡土小说崛起之缘由	13
第二章 中国农民:鲁迅乡土小说文化批判的视点与指向.....	33
第三章 民间风情:五四乡土小说文化批判之内涵.....	71
第四章 恋土情结:五四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化的沉潜迷恋	113
第五章 五四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特征	
——论五四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化精神与民间文艺传统的	
继承.....	149
结 论.....	183
主要参考书目.....	189



文化的觉醒与文学的选择——论五四乡土小说与民间文化之关系

附录 中国现代文学散论.....	194
后 记.....	247

绪 论

考察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乡土小说无疑应该成为一个“重中之重”的部分。这不仅因为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登上了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还在于五四乡土小说开启了新文学直接并多角度地面向乡村民间,关注与审视乡村民间文化的先河。自清末科举废除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逐步分化,被迫或主动流入民间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五四时期,作家更是作为一个与民间疾苦休戚相关的群体,在或以文学为救世武器,或以之为情感寄托,或以之为谋生手段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表达了他们对“故乡”的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是五四这一代乡土作家作为“地之子”终生难以割弃的“文化死结”,而与这种感情相伴随的则是富于理性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于五四时期强烈的传统文化批判大潮中,是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在对放大的“故乡”——国家、民族的文化自觉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如果说对“放大”了的“故乡”的批判更多地具有理性光芒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片“乡土”,则更多地充满着感性色彩和眷恋情怀。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写作具有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强烈的“社会写作”和“自我写作”的双重时代特性。在不同作家笔下,他们也许侧重不同,但正如创造社的“自我小说”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一样,共同的时代语境赋予了他们的“自我写作”一种新的意义:文化反叛的意义——个性

的张扬就是对封建传统文化压抑人性的一种反叛。在文化反叛的意义上,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向世人提供的不仅仅是作为民间文化“个案”的活生生记录,而是整个民族文化真相的片影、侧影和缩影。他们写“地方色彩”,写风俗民情,不是为了掠奇炫耀,而是为了直视一个民族令人心酸的生存真貌,希图激发世人改变的愿望。但这种文化启蒙还是一种“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自省与反思,还是一种声音微弱的“呐喊”。但世纪之初的这种文化觉醒,这种发自内心的呐喊,却成了五四以后的文学家们重要的思想参照和文学创新的源泉。这是跟五四乡土小说所取得的思想与艺术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

如果可以把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看成是文化批判大河的一个支流的话,那么乡土小说创作就是这个支流里面的最为湍急的漩涡。因为它选取了一个最能反映一个民族全貌、真貌的文化审视对象——民间文化,并在对这种文化的深刻剖析中挖掘出了其藏污纳垢的痼疾和催人新生的丸散。因而,考察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对民间文化的审美观照立场、态度、方式、角度、情感、艺境,是颇能窥见一代文人对文化与文学的贡献乃至由此得来的经验教训的。

那么,在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心目中,民间与民间文化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不妨先谈谈一般意义上的民间与民间文化概念。关于“民间”一词,梁启超曾说:“彼官吏者,亦不过自民间来。”^①可见“民间”乃是与“官吏”对应的概念。“民间”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修订本)中被解释为“人民中间,非官方的”两种涵义。实际上,这里包含着一个地域性的空间概念和一个非正统的边缘性的文化概念。“人民中间”意指广大民众的生活空间(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而“非官方的”则指与权力统治中心相疏离,与国家权力机构认可扶持的文化有差异的种种文化形态。在中国长期的皇

^①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权专制统治下，“民间”总是处于一种被奴役、被压制的生存状态，其权力难以保障，其文化难登大雅之堂。而只有当“民主”观念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民间力量才能得以“合法”增长，民间文化才会得到空前重视。五四知识分子重视民间文化，正是中国社会已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标志，也是“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而那场标志着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民间自发的民主运动。那么，什么是民间文化呢？早在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先生就提出了“民间民俗文化”这一概念。^①钟敬文先生后来又说：“……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又说：“我的专业，使我比较熟悉底层的民间文化。”^②可见，钟先生所指的“民间文化”，乃主要指“农民文化为主的文化”。对于民间文化的具体内涵，钟先生似乎比较认同《日本民俗文化财事典》中所列的11个民间文化大项目，今转引如下：

1. 衣、食、住。2. 生产、职业。3. 交通、运输、通信。4. 交易。
5. 社会生活。6. 信仰。7. 民俗知识。8. 民间乐舞、戏剧、竞技游戏。
9. 人生礼仪。10. 岁时行事。11. 口头文艺。^③

应该说，就广义民间文化所包含的内容而言，这11类算是概括得比较全面了。但对于狭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民间文化而言，中国的民间文化应该包括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两个部分。陈思和

^① 钟敬文：《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序言）》，《民众教育（浙江）》第五卷九、十合刊，1937年7月1日出版。

^②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③ 转引自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的收集、保存与新文化创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认为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主流文化艺术传统与民间自在的民风民俗传统一起建构了当时的民间文化形态”。^① 但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尤其是科举废除以后，伴随着工业的发展，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也一步步远离权力中心，进入了“民间”，融入了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都市中层文化”。因而无论从生活环境还是思想意识来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西方民主思想被先进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之后，这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由封建士大夫向以知识为工具进行社会工作的“市民”身份的转换。但政治的、经济的身份转换并不与思想意识领域内的转换同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他们作为知识拥有者的优越感和传统士大夫情调。故而“民间”这一语汇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向他们自己——至少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是这样。在一种与现代化思潮相随而来的，不难理解的“知识中心主义”与“城市中心主义”的作用下，本书认为，在五四时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民间”至少应该包含着这么几层意义：

一、民间不再仅仅是个远离权力中心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与“都市”相对应的概念。

当知识分子为谋生、为求学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聚集，谈到“民间”一词的时候，无疑是指远离中心城市的广大乡村、城镇与边地。如台静农在小说集《地之子·后记》中，就把他写乡村生活的小说称为是“从民间取材”；1922年7月25日《晨报副镌》上发表甘蜚仙的《到民间去》，屡屡提到的是要“向乡间民众讲演”，“跃入乡间社会的大圈里，去观察乡间的实况”等等，文章把“乡间”类同于“民间”的意思显而易见。1934年创刊的《民间》半月刊，也主要谈乡村底层民众的文化生活风貌。

^① 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

二、民间是个与“落后”紧密相依的概念。由于小农生产方式的长期不变和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制度的长期沿袭,民间仍然是个落后的群体和地域,民间文化也仍然是落后的文化。如黄华节在《怎样研究民间宗教》一文中指出:“民众的文化程度依然是神权时代的文化”。^①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钟先生第一次提出“民间民俗文化”这一概念的“民间民俗文化专号”上,介绍的也多是浙江民间与落后生产力相关的风俗习惯。^②

三、民间作为一个人“类”,是个等待救赎的群体。因为落后,怀抱先进思想的知识精英视其为拯救对象是不难理解的。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把“民间”之“风俗”视为是“劣国民”所由出的“根干”,他可以说是比鲁迅更早充分论述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家。梁氏在《中国积贫溯源论》中说:

……故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国民而为良国民也,则任于其中签掣一人为官吏,其数必赢于良;我国民而为劣国民也,则任于其中慎择一人为官吏,其数必倚于劣。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到了五四时期,更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则自觉将思想付诸于行动,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办起大量通俗启蒙刊物,“到民间去”成为一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这些都是他们真诚地向底层民众发出的救助信号,是一个时代的心声。

四、民间常常与“国民”、“民众”、“平民”、“农民”等概念的内涵交叉、叠合,甚至于等同,且在很多乡土小说作家的意识中,这些概念

^① 《民间》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1934。

^② 参见《民众教育(浙江)》第五卷九、十合刊,1937年7月1日版。

都或清晰或潜在地指向民间之众数——“农民”这一群体。这一点将在正文第二章中详尽论及。

五、民间被时代性地赋予了“民族”的意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要表现民族的精神，就必须了解“民间”，进行民间社会风俗调查，大力研究民间文学，如此才能看到民族精神的真实。也即真正的民族精神是蕴藏在民间大众中的。在1921年6月30日的《文学旬刊·杂谭》上，发表署名蠢才的文章《研究民间传说歌谣的必要》。文章说：“……企图真实的艺术创作的，必须摄取民族的心灵，探测民众的深底，使全民族的性格和作者的个性，融合而为一。那么在一方面应该和真实的民众多相接触（如投身农民社会等），在一方面更应该对于民间的信仰习俗歌谣故事等等，都有相当的研究，要是不然，要窥测民族的思想情感，是很难的了。”可见，时人就有把“民族的”和“民间的”，乃至“农民的”并提的时代性见解。同时，向民间学习的运动也是当时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试图在“民间”找到与世界文学同源的力量与活力的一种努力。而事实上，这是不用去找的，而是本来就有的，只是有待于发现。在文学领域，五四知识分子重视民间，向外国学习的同时也向民间学习，只是起一个为文学“正本清源”的作用。正如布瓦洛所说：“新思想是人人都可能想到的思想，只是某人第一个想到要把它说出来而已。”^①五四知识分子虽不是“第一个”说出“民间”的意义，但却是“第一代”倡导“到民间去”；“向民歌学习”并大力付诸实践的分子。故而，他们的理论倡导，文学与社会实践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六、民间是个与所谓“主流文化”、“上层文化”相对应的，具有地域文化或地方文化内涵的文化概念。“地域文化”或“地方文化”构成了“民间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国是个具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国，

^① 转引自[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也是个多民族文化共存共融、相互影响与渗透的国家。中国的民间，就是由一个个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各自相对稳定的人群及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构成的。封建社会漫长的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使得“主流文化”、“上层文化”遍及到民间各个角落，渗入到民众的灵魂深处。但“纵有专制之形，而平民政治之精神，实亘数千百年巍然独存，听讼征租而外，未闻有所干涉。谚谓‘天高皇帝远’，斯言实含有自由宴乐之趣味”。^①五四作家所要批判的，乃是民间的封建正统文化——封建主义的“主流文化”、“上层文化”及其在民间的各式各样的表现形态，而他们所竭力倡导与发掘的，却是“地方民间文化”中的“平民政治之精神”与“自由宴乐之趣味”，以适合、满足时代之需求。

在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既然“民间”具有以上列举的蕴含，则民间文化相应地也就有了“乡村文化”、“封建落后文化”、“农民文化”、“民族文化”等含义在内，虽然它们在具体语境中所指各有不同或各有侧重，但“民间文化”却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包含了这些不可回避的内容。在文化批判成为五四时期作家写作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的时候，民间文化批判的视角必然会指向乡村文化、封建文化、农民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民间”在乡土小说作家的视野中，既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又是一个具有文化再造资源的活水源头。也因为民间及民间文化具有这些内涵，故在文学领域，当小说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成就的时候，乡土小说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对民间文化进行审美观照的主要阵地，并且，五四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化的审美观照，体现了五四文学巨大的文化洞穿力和历史影响力，以及蓬勃向上的艺术再生力。

关于乡土文学及乡土小说概念的闾定，丁帆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论·绪论》中已有详细论述，这里只想侧重谈谈在五四时期，

^①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乡土文学一些比较特定的内涵。众所周知,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是指反映乡村、乡镇等地域的民情风俗、社会风貌,与“城市文学”相对应的文学。但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因思想革命想到了革新文字与文学,而革新文学的参照主要来自“外国”与“民间”。他们认为,封建正统的文言文和由这种文字构筑的文学已经没有了生命力,只有借助于这两者,中国的新文学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如果说鲁迅写乡土小说主要着眼点在于“启蒙大众”,那么,胡适对白话文学的历史考察,对白话工具的重视,周作人提倡的要注意文学“地方色彩”的创作主张,刘复等人发起的民间歌谣运动等,则是为了建立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学格局而考虑的,因为相对于世界来说,中国也是“地方”。可以说,“地方色彩”与“民族特色”乃是当时乡土文学的精髓所在。但如上所述,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民间”概念中已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民族特色”就是一个个“地方色彩”的大融合,是一个个“民间特色”的大杂烩,大一统。这样,乡土文学——民族特色——民间文化就有了内在的紧密联系。因而,五四乡土文学的开创者鲁迅进行文学启蒙的时候,又是有着建立民族新文学的自觉意识的,他虽然没有给乡土文学下过很精确的定义,但他的只言片语,却道出了五四乡土文学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在“异地写故乡”时表现出的“地方特色”和民间文化特征。鲁迅在五四时期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要建立一个乡土小说流派,但他以浙江绍兴乡镇生活为背景,以中国农民为视点的“启蒙文学”,却是“满熏着中国的土气”,因而“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文学家”。^①到了三十年代,鲁迅才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

^① 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30日第1卷第8期。

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在鲁迅眼里,蹇先艾、裴文中等身居大都市的作家叙写边远的“贵州”、“榆关”等“民间”生活的小说,就可以称为是“乡土文学”。另一方面,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主要是小说作家)又深受五四引进来的世界新思潮的影响,有的还有异国求学居住的人生经历,故而他们的写作又不纯粹是那种“本土作家”写“本土”的,乃至与“民间文学”处于同一思想水平线上的写作,而是一种希图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文学写作。故而中国五四乡土小说就有了两个参照:中国当时畸形发展的都市文化的参照和外国文化的参照。这两种文化相对于乡村民间文化来说,都具有“陌生感”,故无论以城里人的眼光还是以异国人的眼光来看乡土作家们成长的地方,“故乡”总是那样熟悉而又陌生,总是那样可爱而又可恨。这种特定时代,特定作家群所表达出来的特定的情感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特定思想艺术风格,本书以为也许就是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基本涵义吧。又因为五四乡土文学的成就主要通过小说体现出来,故研究五四乡土小说某种意义上就足以代表五四乡土文学了。

那么五四乡土小说与民间文化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这种关系具有什么意义呢?

五四乡土小说与民间文化首先存在着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五四乡土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它是当时科学与民主思潮,社会主义思潮,“走向民间”的社会风潮,以及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向民间学习”的民间文学运动等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既为乡土小说作家对民间文化进行审美观照时配备了现代的思想武器,从而使其对民间生活的反映侧重于“文化批判”和“人道同情”,同时又为这种审美观照提供了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的驱动力,从而使作家对于民间文化的反映有了自觉的目的